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日] 白川静——著

[日] 国久健太 崔倩倩——译

中国古代文学

从神话到楚辞

崔倩倩



中国古代文学

从神话到楚辞

[日]白川静 著 [日]国久健太 崔倩倩 译

后浪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文学：从神话到楚辞 / (日) 白川静著；
(日) 国久健太，崔倩倩译. —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220-11053-5

四川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21-2018-476

I. ①中… II. ①白… ②国… ③崔…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 IV. ①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0369 号

CHUGOKU NO KODAI BUNGAKU (1) SHINWA KARA SOJI HE
BY Shizuka SHIRAKAWA

Copyright © 1976, 1980 Shizuka SHIRAKAW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UOKORON-SHINSH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Ginkgo (Beijing)
Book Co.,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HUOKORON-SHINSHA, INC. through Bardor-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归属于银杏树下（北京）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ZHONGGUO GUDAI WENXUE CONG SHENHUA DAO CHUCI

中国古代文学：从神话到楚辞

著 者	[日] 白川静
译 者	[日] 国久健太 崔倩倩
选题策划	后浪出版公司
出版统筹	吴兴元
编辑统筹	梅天明
特约编辑	石儒婧
责任编辑	梁 明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张 萌
营销推广	ONEBOOK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E - mail	scrmcbs@sina.com
印 刷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3mm × 210mm
印 张	9.25
字 数	196 千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978-7-220-11053-5
定 价	42.00 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64010019

目 录

第一章 文学史的方法·····	1
一 东亚世界·····	3
二 两种文学史·····	8
三 古代文学的问题·····	12
第二章 神话与经典·····	23
一 偏枯之神·····	25
二 启母石·····	32
三 神话与思想·····	37
四 神话与经典·····	45
第三章 表达与表现·····	55
一 飞天之物·····	57
二 水与草·····	68
三 祭礼与歌垣·····	78
第四章 古代歌谣的展开·····	93
一 歌谣原始·····	95
二 建国诗·····	104
三 君子赞颂·····	109
四 二雅诗篇的展开·····	116

第五章 诗篇百态	129
一 民众的生活	131
二 挽 歌	142
三 物语之歌	152
第六章 关于物语	159
一 悲剧的圣人	161
二 贵种流离谭	168
三 《左传》与《国语》	175
四 伍子胥神	183
第七章 思想与文学	193
一 天之思想	195
二 儒墨之学	203
三 寓言与寓话	209
四 马王堆帛书	219
第八章 楚辞文学	227
一 祭祀歌谣《九歌》	229
二 《离骚》文学	245
三 关于《九章》	256
四 巫祝者的文学	266
五 屈原的弟子	276
参考文献	281

第一章

文学史的方法

一 东亚世界

关于日本古代是否存在过英雄时代——或是否存在过英雄叙事诗的问题，曾经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在战前，高木市之助博士的《吉野之鲇》（1941年）中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在此书的《日本文学中的叙事诗时代》章节中，关于《古事记》（以下简称《记》）和《日本书纪》（以下简称《纪》）中称为《久目歌》^①的久米部传承歌谣，即提出日本英雄时代的存在问题。而这些叙事诗性质文学的成熟，正是肯定地表明，所谓英雄时代确乎存在。这个问题，在战后石母田正氏的《古代贵族的英雄时代》（《论集史学》，1948年）一文中，基于新的问题意识重新提出；继而西乡信纲、川崎庸之、藤间生大、北山茂夫、井上光贞等诸位学者进行了活跃的讨论。这与战后天皇制的问题亦有关联，引发强烈的现实关注。若所谓英雄时代，在各民族发展的一定阶段，规定了该民族朝向历史时代迈进过程中的特征，则其与此一时代历史性质以及文学样式之间的关联，自然会成为古代文学史上重要的

^① 通称久米歌或来目歌，传为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征伐时所作。——编者

问题。

对于这样的问题，当然也应该把中国的古代史以及古代文学史，纳为比较研究的对象。但是通过这场争论，并没有引出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当然，提供比较考察资料的研究人员自是难逃其咎；然而时至今日，此一事态依然看不到前进的迹象，这一现象或许依然值得反省。而且该问题不仅限于英雄叙事诗，通过种种样式的建立以及种种样式史的发展——包括神话和王室的传说物语^①，一般意义上的古代歌谣，以及叙事诗和抒情诗的成立——都可以引出无限多样的课题。同是在名为亚洲的地域里，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东亚世界，又具有尤其深切的亲缘关系。日本的问题，往往同时也是中国的问题。

从结论上说，我认为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充分意义上的英雄时代，而且也不存在英雄叙事诗。同时，历经英雄时代而形成的城邦世界，于城邦世界形成中大出风头的英雄传承，以及将此一传承作为民族统一的场所，这种种条件亦毫无明确的迹象。我想，这或许便是将东亚古代与古典古代区分开来的重大分歧点。从迈锡尼到古典古代这一段漫长的暗黑时代之后，英雄叙事诗得以出现；但从社会史的对应关系来看，中国诗篇的时代才与之相近。但此时出现的并不是英雄谱系，而是被贵族化的族长以及隶属其下的民众。东亚的古代歌谣时代，产生于古代氏族制的核心部分

^① 物语，日语，为日本散文文学形式之一，盛行于平安至镰仓时代。始于《竹取物语》，按内容分为写实物语、歌物语、军记物语、历史物语等。白川静在此书里向以中日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亦常以日本文学史名词概言中国的类似文学形式，此词即是一例。为突出作者的观点与分析思路，我们一般保留日文汉字，酌情加注说明。为明晰起见，“物语”一词在此勉强译为“传说物语”。——编者

由于外部压力而瓦解、新的阶级社会关系得以建立的时期。《诗经》(以下简称《诗》)和《万叶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成为比较分析的对象。但这样的研究,现今基本上没有进展。

从中国古代文学这样的研究状态来看,匈牙利的东洋学者杜克义(Ferenc Tökei)的《中国悲歌的起源》(1959年。日译本,羽仁协子译,1972年)一书,是首次将中国古代文学以比较文学而研究的书,颇值得注意。中国文学不仅从日本的视角,在世界文学当中亦久而处于孤立地位。中国至今还使用象形文字——汉字来表記,这种全然异质的语言,可以说一直被排除在外。作者在书的卷首宣称,要“对本书中所提及的问题,尝试进行初步探索”;有关此书的主题,他说:“作者自己提出的课题,在于大略回答下面的问题:在古代中国,为何英雄叙事诗这种诗歌体裁没有发展起来?具原始性又具开端性的叙事体各形式,是朝着怎样的方向而发展的?为何 elegy(悲歌)能发展为中国诗歌世界当中代表性的体裁?”论及研究方法,他则是意在“中国文学的诸开端,以及最初阶段重要的作品,以这样的方法进行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体裁论亦会有所贡献”。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位作者亦有专文引介到日本,可见其对先人的介绍相当忠实。基于这样的社会史理解,该作者便将碑传文学到《楚辞》为止的古代文学发展过程,当成了悲歌的形成过程。

具有如此明确问题意识的中国古代文学论,在日本尚没有出现。然而,这并不能归因于研究者的怠慢,毋宁说是他们对这个问题的难度有着充分的理解。对我而言,这样的问题意识亦非全然不懂;只是考虑此一问题的先决条件尚不够充分,在本书中终

究也仅能提供若干资料而已。即便以《诗》和《楚辞》为中心而考量，对这两本书的基础研究依然颇嫌不足。

杜克义在此书中提出的论点，在我们看来，存在着许多明显不够成熟的破绽。西方研究者想要理解中国古典文学，比之我们这些日常使用汉字的人要远为困难。即便在日本，中国古典以及古代文学的研究，较之战后对于日本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亦大为逊色。时至今日，对于神话领域，尚无人将其作为民族想象力的最初表现形式进行研究；而关于神话与民族历史生存方式具有何种关联的问题，也无人作为思想史问题进行研究。与此同时，也几乎无人带着比较文学的问题意识，来看待古代文学。不过而今，人们已经强烈要求这样的视点。日本的英雄时代论关系到现实中尖锐的问题意识，中国古代亦需要现代光照的投射。因为这与我们目前提出的问题，也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上，一直处于长久的孤立状态当中。杜克义说：“一切民族的文学都属于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在他这位马克思主义者眼里，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论，可以扩大运用到第三世界；这固然可以视为理论所需，但在西方也出现同样的现象，例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新人道主义的名义，西方思想家亦倡导同样的观点。然而东洋摆脱孤立状态的动因既然来自外部的推动，则东洋人不免会感到些许反弹，因孤立并不能从外部得到解救。由此及彼，收彼入此，舍此并无能够克服之途。孤立并非仅仅是环境的问题，也关系到民族历史的发展方式。从而，这种克服唯有通过自身的历史实践才能做到。

东洋的孤立已旷日持久，但东洋二字用来表现文化形式，却依然仅仅是一个模糊概念，因而相当不稳定。严格来说，东洋在世界上从未存在过，而仅仅作为“非西洋世界意义上的东方”这种莫名其妙的概念。因之东洋一词，因使用者所异，或指波斯，或指印度，或指中国，甚或也指日本，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与东洋的比较思想论研究在西方重新盛极一时，但大抵是以印度的古典思想为对象。特别是，这种研究实则是一种德国中心论，因这些学者所热衷的，乃在于要在印度思想当中，寻得在欧洲不能不意识到的异质性之根源，便是热衷于追求所谓印度-日耳曼精神。另一方面，作家和思想家里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学、日本的文学和文化感到兴趣的代不乏人，然而他们也不免都用“东洋”这样的笼统字眼，把中国与日本的文化变成研究的客体。要之，“东洋”一词，仅仅是极不稳定又极无规定性的概念。

提及所谓东洋的历史世界，首先便可以想到东亚的各个民族。事实上在这个区域，至少确乎存在着能称为东亚文化圈的地域——这是经由汉字、儒教、佛教以及诗文和艺术构造出来的文化区域。以西方视之，欧洲各族之间某种微妙而根本的差异我们并不能够轻而易举地辨认出来；同样，在他们眼里，东亚世界各族之间微妙而根本的差异，亦不能够轻而易举地辨认出来。这样讲来，东亚世界算得上欧洲意义上的世界吗？我们很难给出肯定的回答。即便地域范围内有文化圈存在，却并不存在能够称之为世界的精神联结。问题的首要关键就在于此。

东亚过去并不存在欧洲意义上的世界。在这里不存在任何连

带、任何共存，亦不存在共同的目的。以日本而言，与中国之间只有单纯的影响关系，而且也不过是间断的影响。接受影响的方式极其随意，极有选择性。适度断绝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其实乃是对日本本土固有文化土壤的保护，有助于日本文化自律性的发展。而中国往往以文化之源的身份，作为宗主国君临统治。对中国而言，这便是华与夷判然分开的世界，几乎有似于罗马的世界的状况。古代亚洲的落后性，在于这罗马式的世界无法自我解体，民族之间的平等无法实现，或可说亚洲的专制体制对外扩展到国际关系当中。将东亚变成一个世界，不能不成为我们紧要的课题。

二 两种文学史

亚洲在过去未曾成为一体。包括印度在内的所谓“亚洲一体”，只存在于追求东洋理想的那些理想主义者的想象当中而已。现在的亚洲，被分成社会体制各不相同的国家群体；这种分裂状况，并不会轻易消失。国家之间联结起来的可能性也少之又少。同时，中国致力于第三世界的形成。亚洲既已失去了过去文化圈上的意义，而仅仅成为地理上的概念。对于不懈努力企图在古代亚洲文化当中找出联结基础的人，寂寥的景况真是莫此为甚。

杜克义曾经讲：“一切民族的文学都属于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为了验证此一观点，唯有令一切民族的文学都举出其全部的文学史实，并能够加入到世界文学中来，才算得上充分满足。首先将“世界文学”一词开始作为学术用语使用的，或是莫尔顿（Moulton）等人。他在《文学的近代研究》一书的序言中，对自

己的写作目的阐述道：“我最后的工作，并不是将整个文学世界变成一个个特殊文学的集合，而是试图以英国人的立场展望得出的世界文学概念，来对文学世界进行把握。”（本多显彰日译，序三）。这种思考方式与弗雷泽（Frazer）等人的民俗采集相同，乃是光荣的英帝国时代的思考方法。然而，文学并不是采集到的东西。

世界文学只能通过比较文学的方法来达成。比较文学虽然有将近百年的历史，但基本上是在欧洲文学内部进行研究，其方法也主要是追溯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影响关系。这些文学既然早已构成一个世界，则在文学史的体系当中自然无法存在作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材料。由此观之，不处于同一世界的东亚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既然身处同一个文化圈当中，各自自行完成自己的发展过程，则这样形成的文学，也不能不把其他文学变成研究对象。这两种文学史作为比较对象而言，可以说才最具备适当的研究条件。

杜克义将希腊文学选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有一定理由的。杜克义身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有义务通过这两种文学，从文学史上证实亚洲——古典古代——日耳曼的发展阶段论。他的目的，就在于从悲歌和叙事诗的文学体裁理论角度来证明这一点。从而由其目的来说，只消把亚洲的悲歌和古典古代的叙事诗做出对比，其任务就算已经完成。论证过程姑且不论，该课题既经设定，答案便已经预设完毕。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遗稿发表之前，多有研究者将中国古代视为都市国家。这些研究者认为，中国古

代也存在古典时代；而杜克义则对此明确否定。他在书的开头说：“古希腊社会成功地与（亚洲）原始社会的所有关系绝缘。另一方面，若说亚洲社会采纳了这些关系，且本质上一直维持到今日，则我们便需要弄清，是怎样的原因使希腊能够取得这巨大的进步。探讨亚洲社会缺乏的必要原因是哪些，还算不得什么要紧的课题。”然而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正是认为，原始的所有关系“本质上一直维持到今日”，这便会导致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因之，20世纪30年代的讨论即行停止。所谓“我们不是猿猴，也不是神”，为符合马克思的发展阶段论而在古代设定奴隶制；然而，马克思并没有认可亚洲存在着这样的历史发展。

摆脱东亚孤立的方法，无法求之于如此贫瘠的生产方式论。我认为，要恢复东亚的文学地位，就必须将其视为文学史的课题。中国文学，仅从文字形成之日算起，已经拥有三千数百年的历史。日本文学纵然绝对年代远远落后，也已有一千数百年的历史。论到此时期的古老程度，则例如发生诺曼征服（1066年）的世纪之初，日本已经创作完成了《源氏物语》。而中国古代歌谣——诗篇^①的完成，乃在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这一时期，比之公元前6世纪后期完成的荷马史诗早了几百年。东亚这两种文学史，都有着其他文学史无法企及的悠久历史，亦各有自己本来的风格样式。于此，存在着从神话时代直至现代的两种文学史的典型。比较文学的方法，不能不适用于这文学史的全部体系；然而就研究对象而言，如此符合的现象还未曾有。可以说，这里存

① 白川静在本书里常用“诗篇”一词指中国的《诗经》，间或亦包括中国先秦古诗，读者识之。——编者

在着一条通往世界文学的路径。

日本文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学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万叶集》的出现，从作品来讲与《诗》并无任何关系。然而，这是古代歌谣在特定社会史条件下出现的作品；从历史社会性质极其相近这一点而言，两者又具备基本的相同性。两者的表达与表现，其古代的特征明显一致。加之其所歌咏的内容，并非像印度那样以宗教体验为主，毋宁都是现实社会及其生活，这一点也颇为近似。或许古代氏族制作为转而变成贵族阶层社会的最后阶段，在受到阶层沉重压力而瓦解的古老氏族社会的解体中，即会产生出这样的古代诗歌时代。如若这种破坏者是外来的侵略者，是喜欢战争和杀戮的英雄，可能就会产生赞美英雄的叙事诗。是特殊而具决定意义的历史社会形态，决定着英雄时代的有无。

两种文学形式上相同的显著事实之一，便是两者都可以提出其超越时代的民族文学亦即诗歌的形式，这就是中国的诗和日本的和歌。历经悠久的岁月，经过众多的作者，而以一种诗歌形式在文学上接近起来，可谓史无前例。许多有修养的人，都既是诗人又是歌人。这样的民族形式，当与文学传统息息相关。同时，在这种传统的持续当中，或许亦能看到社会史、精神史方面的问题。

两种文学在历史上并无相交。当是语系不同，决定了这样的现象。日本早已把汉字用音读训读的方式来使用，用独创的训读法将中国古典文学国语化之后，便能够阅读出来。但这终究只是一种接受方式，难以成为创作的形式。自古代文学以来，说话、

物语、日记、随笔、战记、歌谣、小说、戏曲等日本文学样式，均作为日本固有的形式而发展起来。同时，各种体裁相继出现的顺序，大体上也与中国相同。两者不谋而合，表现出同样的发展途径。这表明，在文学发展中起作用的规律，在社会发展中颇具自我规定性。而在这种自我规定的发展中，既然存在相互对应的现象，正说明两种文学史各有其典型意义。比较文学的方法，唯将这种文学史的整个体系作为对象，才能符合其本来的目的。如杜克义所说，“一切民族的文学都属于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即便如此，这种比较文学的方法若无法带来系统性，到头来也只好终止于采集工作。在这里，并没有使问题具体化的办法。

三 古代文学的问题

在很多情况下，神话都是民族文学的摇篮。神话是民族统一原理的象征，神话的传说物语，乃是历史传承最具生命性的形式。从这种形式之中，即产生新的创造。文学也可视为是这种创造的一部分。祭祀仪式，就是最初举行歌舞和咒诵的场所。

但在中国，神话并没有以神话的形式传承下去，以此中国被称作无神话之国，中国的神话也被称作枯竭的神话。神话并不以集体表象而得到系统性，而是保持无组织的状态，留存于巫祝社会。神话脱离开民族形成的地点，也没有被组织成形。按照神话学者的说法，日本神话的组织化处于国家的纵向涵盖关系当中，而希腊神话的组织化则处于部族的横向对立关系当中。但在中国，如《楚辞·天问》篇显示，神话在时间和空间上均未排列顺序，